

研究論文

十字架下的「農民工」：宗教、社會 轉型與民工基督徒主體性的建構

高權 錢俊希

高權 英國紐卡斯爾大學人文地理學博士生，華南師範大學文化產業與文化地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E-mail：q.gao2@newcastle.ac.uk。錢俊希 香港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E-mail：jxqian@hku.hk。通訊地址：香港特別行政區薄扶林道香港大學地理學系。本論文受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移民的人地互動與地方協商研究——以珠三角為例」（基金編號：41630635）和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基金編號：41401141）資助。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編委會就文章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6/01/11，接受刊登：2016/11/09。

中文摘要

本研究立足於中國的社會轉型和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背景，探討農民工研究中宗教信仰這個長期被忽略的社會認同和歸屬的維度。通過深圳市民工基督徒的案例，本論文研究了宗教信仰對農民工主體性和身分認同的建構，並由此透視社會變遷背景下宗教、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秩序與民工公民身分之間的關係。民工基督徒的主體性建構是鑲嵌在多重身分差序的矛盾與衝突之中：一方面，宗教確實給予了農民工一個應對和調適現實社會的生存策略；另一方面，但在階級與身分的雙重壓迫下他們仍然無法通過宗教實現對主體性的全新重構，宗教提供的資源既不能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又不能增強他們公民身分，不但如此還使他們在「多重邊緣人」的身分中進一步被邊緣化。

關鍵詞：農民工、宗教、基督教、社會轉型、主體性

**Beliefs at the Margins: Relig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f Migrant-worker Christians**

Quan GAO

School of Geography, Politics and Sociology, Newcastle University; Centre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un-Xi QIA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Religion has long been understudied in th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especially in studies of religion in the lived experiences and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ransformational China.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among Christian migrant workers, with a focus on Christian churches in Shenzhen. Although Christian migrant workers are subjected to the state's institutional rules and exploitation by global capital, they are not entirely passive recipients, and are capable of using religious values to re-interpret existing social inequalities and labor alienation. However, the restraints of multiple differential statuses imposed on migrant workers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reconstruct their subjectivity via symbolic meanings offered by Christianity.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religious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current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religion, Christiani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subjectivity

一、導言

如今中國已進入社會轉型的加速時期，這不僅是在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資本的驅動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還是一個各種社會思想相互充斥、協商，以及社會價值體系建構和重構的過程。宗教以及社會個體的宗教信仰是理解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維度，因為它往往體現了社會個體的精神世界如何回應日常生存體驗，是社會發展的一面鏡子。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歷的宗教復興一定程度上是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遷、國家與地方權力結構的變化、精神和文化的斷裂、現代性社會風險的增加等因素在精神領域的反映（梁永佳 2015；Yang 2011；Yang 2008；Joseph 2007；Bays 2003）。但是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深入推進、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以及急劇增加的社會流動性，城鄉宗教景觀的地圖正在發生著悄然的變化。一個極為典型的例子是，作為構成中國基督教主要信眾的鄉村基督徒，在城市化過程中向城市大量湧進並形成了一個新興的城市宗教景觀——民工基督徒群體。然而這並不是民工基督徒的全部，還有大量來到城市後由於獨特的生存體驗和社會體驗而選擇信仰基督教的農村務工者。作為中國社會的邊緣群體的農民工，他們一方面承受著戶籍制度等制度性的安排，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接受日益被社會廣泛建構甚至是制度上合法化的「農民工」身分（陳映芳 2005）。不但如此，他們還經歷著城鄉之間的文化斷裂以及漂泊在城鄉之間的「無根性」體驗（楊慧瓊 2012）。因此，農民工群體在城市社會尋求宗教作為精神庇護和生存策略，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其背後隱藏著宗教及宗教意義的社會建構機制。本研究試圖探討的是農民工研究中宗教信仰這個長期關注不足，甚至被忽略的維度，並以近期迅速發展的基督教新教和深圳市外來民工為研究個案，將農民工的宗教

信仰問題置身於當今中國社會轉型和農民工群體真實的生存、勞動體驗之中，探討這一社會邊緣群體主體性和身分認同的建構、維繫，乃至重構的機制。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框架

（一）社會轉型與宗教的社會建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在經歷的持續和劇烈的社會轉型，已經受到社會學者的高度關注（孫立平 2005）。「社會轉型」概念作為描述和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歷史的轉型的重要理論視角和方法，已成為被學界廣泛採納和討論的問題。這一過程既包括制度和結構層面的變化，又包括精神世界、主流意識型態、價值觀等社會心理層面的變化，是一種社會系統全面的、結構性的調整和轉變。在制度和結構的轉變方面，李培林（1992）的《另一隻看不見的手：社會結構轉型》一文較早採用「社會轉型」的理論視角探討中國重大社會變遷。這種社會制度與結構的轉型本身已成為了國家干預與市場調節之外，影響社會資源配置的另一隻看不見的手（李培林 1992）。基於當今轉型時期的社會現實，孫立平（2003, 2004, 2006）著眼於社會轉型的矛盾與機制，並提出了斷裂社會的論斷。他指出這種結構性的斷裂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產業的轉變和制度的變軌引起的大量失業和下崗現象；「城鄉二元結構」導致龐大的農民和城鄉流動人口群體被邊緣化甚至拋棄在社會結構之外（郭於華 2007）。然而社會結構向多方位、多層次和多向度變遷的過程中，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權利的失衡」，導致階層分化向階級化型塑（孫立平 2003, 2009），從而生產和再生產出更大的社會

不公正與社會的裂痕，並衍生一系列諸如貧富分化、社會焦慮、道德失范和信任危機等問題。另一方面，社會轉型也是社會關係和生存體驗重構的過程。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指出現代化雖然改變了社會結構與社會能動性的關係，使人們從以階級、家庭、性別和宗教等社會結構的規範中解脫出來，但個人卻要承擔著「自我建構」的責任和面臨不確定性的風險（Beck 1992）。哈伯瑪斯（Habermas 1984）和紀登斯（Giddens 1991）都認為向現代性轉型的社會容易面臨著精神世界空虛、身分認同不穩定、文化意義缺失的危機，因為社會分化與社會專門化使人們從日常生活的意義中剝離出來，從而被納入到一個以資本積累與工具理性為核心目的的現代社會系統中。

在很大程度上，歐美社會理論家所描述的現代性的危機與隱憂也是中國轉型時期正在經歷的。從以親緣和地緣為紐帶的「鄉土中國」（費孝通和劉豪興 2011）向現代性的中國轉變的過程不僅伴隨著社會關係的重組，還伴隨著傳統信仰和地方知識的瓦解和新的社會感知體系的重構。中國現階段的現代化進程實質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下社會生活的重組，金錢和生產性（productivity）逐漸成為衡量個體的新的價值準繩（Anagnost 1997），標準化和功利化的生活軌跡重新刻畫了人們對時空的感知。雖然排山倒海的現代性轉型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物質進步，但也同時瀰漫著不確定感、厭倦、異化和強烈的無根感等情緒。社會學家楊美惠（Mayfair Mei-hui Yang 2008）指出，西方向現代性轉變所衍生的一系列猶如精神缺失（spiritual impoverishment）、物質過剩（material overproduction）、階級極化（class polarization）、鄉村貧窮（rural poverty）、城市貧民區（urban ghettos）等現象都在某種程度上也在中國反復上演，動搖並瓦解著根植在地方文化與信仰系統中的價值體系。但社會轉型作為一個從傳統到現代過渡的時期，「文化的斷裂」、「文

化的鄉愁」和「無根感」等體驗是當前急劇社會變革中不可忽視的現象，這也說明中國正處在一個精神和文化的斷裂期。因此，在轉型背景下社會成員如何通過主體的能動性構建起自己的意義系統，應該成為學術界關注的問題。

反思現代社會與宗教之關係正成為理論界與思想界的當務之急（王曉朝 2009）。宗教是社會生活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維度，它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的一面鏡子，是轉型時期社會個體精神體驗的回應和折射。但宗教又不是一個純精神領域的問題，它與廣闊的社會經濟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繫。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等理論家都從宗教系統之外的社會現象和更為廣闊的社會變革中去理解宗教的起源、運作和組織，將宗教視為一種社會的建構而不是脫離社會生活的一個實體（Beckford 2003: 27）。山繆·杭亭頓指出，引起20世紀後半葉全球性的宗教復興最明顯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認為會引起宗教消亡的東西：急劇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現代化進程。隨著傳統認同和權力體系的瓦解，人類需要新的認同根源、新形式的穩定社會，以及新的道德規範來賦予他們意義感和目的感以應對不穩定的社會關係（Huntington 1997: 95）。近二十年來中國也經歷著宗教的復興特別是「基督教熱」的現象，無論是植根於鄉土的民間信仰和祖先崇拜、本土宗教還是基督教等非本土宗教，都如雨後春筍般發展（Kipnis 2001）。其中基督教新教的發展最為迅猛，信眾從1949年不到100萬增長到2008年的1700萬（Katrin 2010; Bay 2003）。2007年華東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新教教徒可能高達4000萬（Wu 2007），這一定程度上歸因於基督新教比其他宗教具有更高的可進入性和低廉的信仰和儀式成本（Bay 2003）。

宗教復興現象無疑是中國持續的社會經濟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反映：諸如宗教政策日漸開明（Hunter and Chan 2007）、城鄉發展的不

平衡（梁麗萍 2006）、資本和全球化對生活的異化（Yang 2008; Yang 2005）以及社會價值體系和規範的重構（Joseph 2007）等因素都是推動人們皈依宗教，尋求心理庇護和情感滿足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紀以來在經歷的各種文化激進主義運動對地方宗教和傳統信仰的破壞和瓦解，而又尚未形成新的系統性的解析權威之前，宗教特別是基督教成爲了社會民衆對日常生活意義建構，以及策略性地抵抗社會變遷所帶來的精神空虛、無意義感、不確定性的一種文化策略。

雖然學界對中國基督教的發展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但很多學者仍沒有突破過於政治化和宏大敘事的研究。他們將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宗教復興看作是宗教群體對國家權力的回饋，從而遵循國家管制—教會抵抗的二元制的研究模式（Potter 2003; Yang 2006; Anagnost 1994; Kindopp 2004）。顯然，這些研究都忽視了草根社會群體的宗教實踐和具體的生活情境，以及宗教在特定社會情境下的再建構和再生產。雖然宗教社會學對宗教發展的制度話語已經給予了足夠的關注，但「對中國宗教的研究不應僅僅糾結於傳統意義上的宗教設置層面，而要進一步深入到宗教個體的日常實踐當中，側重從個體的主體性與地方性兩個方面考察評價宗教的社會性建構及其社會影響」（Cao 2010: 21）。尤其在社會變遷的複雜背景下，以下兩個方面應該受到關注：（1）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建構起宗教的體驗，並以宗教體驗爲基點建構身分認同；（2）宗教如何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實現意義的再發明與再生產。例如曹南來的研究發現在具體的社會情景和實踐方式下，宗教給予人的不僅僅是建構生活意義和維繫身分認同的一套符號系統，它還鑲嵌在地方的權力關係中，是人們獲得公共空間、社會權力和資本的一種資源（Cao 2010）。方文（2005）關於新教群體「群體符號邊界」形成的社會心理機制的研究發現，基督徒群體的身分認同與群體符號邊界的建構是動態的而不是

凝固的，在社會流動和社會變遷中會可能經歷跨越、解構和重構的過程。從微觀的層次看，行動者對宗教身分的選擇，即舊群體資格的放棄和新群體資格的獲得（方文 2005），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心理在宗教信仰上的展現並揭示社會的宏觀變化。楊鳳崗對宗教與身分認同的研究最為典型，其構建的疊合認同理論則敏銳洞悉了宗教徒多元認同的建構機制（Yang and Ebaugh 2001; Yang 2014）。作為一個移民群體，華人基督徒既沒有被動地接受文化的同化，又沒有固守族群的邊界拒絕融入，而是同時圓滑地建構美國人認同、華人認同和宗教認同，將這三種認同疊合在一起而形成疊合認同（adhesive identities）。楊鳳崗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在跨國流動的背景下，具有多重身分的宗教徒如何策略性地協商自己的身分。此外，基督教作為近代才在中國興起的西方宗教，它又是如何在非西方的情景下進行適應、轉化和地方化的？西方一些學者提出「宗教」（religion）本身就不是一個具有文化普遍性的概念，而是現代西方的發明，是後變革時期特定歷史和政治條件下興起的產物（Fitzgerald 2000; Dubuisson 2003）。那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將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簡單看作西方基督教儀式和意識型態的移植以及對地方社會秩序的重構，而是要研究基督教在特定社會情境下如何被地方的行動者重塑和再發明。

（二）宗教與農民工主體性的建構

一般認為，農民工是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雙重轉型」的背景而下催生的一個群體，是中國特殊時期社會經濟的產物（王小章 2009）。作為一個由各種行業、地域、籍貫等社會關係交織而成的一個「圈子」（項飆 2000），農民工並非是內部勻質的群體，而是在社會

制度安排下被構建起來的一個社會身分。早期對農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這一新興群體的形成機制（宋林飛 1995；池子華 1998）、生存境遇和經濟狀況（黃平 1997；李強 1995；唐燦 1996；蔡昉 2000）、社會組織和社會關係（李培林 1996；王漢生、劉世定和孫立平 1997；項飆 2000）等方面展開，揭示了農民工在城市社會邊緣和弱勢的社會地位。正如王小章（2009）所言，農民工研究很長時間裡都遵循這種「生存—經濟」的敘事模式展開。而近期學界對農民工的研究也發生著研究範式的轉變，即從「生存—經濟」敘事模式轉向強調農民工主體性的「身分—政治」敘事模式（王小章 2009），更加關注農民工的主體性建構以及如何作為個體而被社會承認。改革開放以來，全球資本帶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與急劇增長的流動性和地方重置，促使很多農民放棄了傳統的生活方式，甚至放棄了故土。在現代都市的生產方式、文化價值與行為規範的框架之下重新建構自身的生活與身分認同，並體驗著漂泊於城鄉之間的「無根感」生活（楊慧瓊 2012）。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農民工的主體性建構主要受到社會制度、資本和勞動力等結構性的制約，正如吳介民（2011: 51）所言「農民工在目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框架中，同時遭受著階級與身分的雙重剝削」。這種剝削與身分差序體驗無疑是構建農民主體性的核心要素。

首先，在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民工」事實上是被主流話語和社會制度建構但被城鄉遷移者被動接受的一個帶有歧視性的身分，這一身分的形成是在現行「戶籍制度」等社會制度的安排（陳映芳 2005），也是一種公民身分的制度化排除機制。這種不公平的戶籍制度之所以長期存在，一方面是由於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建立的人口管制制度形成的「路徑依賴」，另一方面是以「市民權」為依據對社會資源的進行分配（Solinger 1999; Chan 1999；陳映芳 2005）。Anagnost（2004）洞悉

了在理性的市場經濟模式對農民工主體性的生產，揭示了農民工作為一個缺乏社會資本的群體如何被貼上「低素質」的標籤而淪為參與全球化分工中的廉價勞動力；這種素質的政治進一步成為了強化和再生產農民工主體性的工具——在霸權式的話語表徵下，成為一名農民工本身就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低素質」。如過去將城鄉遷移者賦予「盲流」、「流民」等官方稱謂，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這個群體的集體認同。中國實際上利用與公民身分綁定的制度上的福利來壓制和減少農民工對於社會資源的消費，來維持低廉的勞動力價格，以迎合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Wu 2010）。

其次，作為同時受到全球資本主義剝削的群體，階級也是農民工無法逃離的身分體驗。農民工的主體性建構也被很多學者放置在圍繞「剝削—抵抗」而展開的抵抗的政治、認同的政治和「階級意識」的形成等問題下分析（Pun 2005；陳敬慈 2012；潘毅 2007；Nang 2009；潘毅、盧暉臨和嚴海蓉 2009；盧暉臨和潘毅 2014）。在社會結構轉型的背景下，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捲入了「全球勞動分工」之中。農民工群體的興起受到全球資本主義驅使，其生活體驗和主體性建構也是交織在這一體系之中。因此，從階級分析的視角去研究農民工在市場經濟體系下資本對農民工的控制和壓迫也是農民工研究的重要方面。如在現代「工廠政體」（factory regime）和宿舍勞動體制的控制下，農民工的身體深受各種「權力微觀技術」的規訓而被馴服為資本積累的機器，承受著精神上 and 肉體上的雙重痛楚（Pun 2005；潘毅 2007；任焰和潘毅 2006）。例如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的「死亡列車」悲劇，一定程度上是工人對長期以來受到全球資本和「工廠政體」的剝削而產生的精神異化的集中爆發，也是富士康工人作為弱勢群體所採取的悲劇式的抗戰方式（Chan and Pun 2010）。潘毅等的研究還指出民工如何對現行不公平的

制度做出抵抗，以及如何利用各種資源和策略來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況，並分析了農民工作為一個新興工人階級艱難孕育的過程（潘毅、盧暉臨和張慧鵬 2010）。這些研究關注了農民工如何從生產的政治（剝削與抗爭）發展為身分的政治（階級意識的形成）。

總之，在「雙重壓迫」的背景下農民工的主體性建構事實上處於城市與鄉村、工人與農民、文明與非文明、剝削與反抗等**多重身分差序的矛盾和衝突中**。這種公民身分差序和雙重剝奪的制度形態，是由國家政策、地方官員、資本之間結盟設計和運作的後果，從而使民工遭到系統化、制度化的不平等待遇（吳介民 2011）。但農民工的身分認同不應簡化為戶籍制度的安排和階級意識的形成兩個問題，農民工的主體性實質是多樣的、流動的，是一種「透過以無數可能的方式利用外來的資源來發明自身」（de Certeau, 1988: xii），以獲取承認和爭取平等的過程（余曉敏和潘毅 2008；王小章 2009）。余曉敏等（2008）認為農民工群體具有「多樣主體性」，她關注諸如「新生代打工妹」這樣的群體如何在生產領域被國家、資本和社會建構為低等和廉價的「勞動主體」，但卻在消費領域實現對主體性的再造和身分認同的生產，成為平等和有尊嚴的「消費主體」。正如E. P. Thompson所宣導的不能忽視「工業化」過程中工人階級主體性的質變過程以及工人社會或文化的能動性，而簡單地將階級看做一個社會經濟結構的決定物。**其中宗教作為構成個體認同和歸屬的重要來源，是理解農民工主體性建構不可忽視的一個維度**。首先，宗教作為一種解決自我消解和精神空虛的方式，能為社會邊緣和被剝削的群體提供精神上的依託甚至是逃避現實苦難的一種方法。正如格爾茨所指出的宗教作為一種可以對生活世界中不安和不確定性提供解釋的象徵體系，使得生活中的苦難成為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社會現實（Geertz 1999）。E. P. Thompson 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

就詳細分析了工業資本主義背景下循道衛理教（Methodist）與工業紀律和工人主體性之間的關係。循道衛理教宣導的紀律與服從之所以能使工人心甘情願地成為「出賣自己勞動的奴隸」，繼而成為了迎合工廠主的「道德的機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為工人的主體性建構提供一種可能，讓被剝削的現狀變得可以被理解：

對於浪跡人間的工人來說，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這（循道衛理教）是進入新群體的「入場券」。在這個宗教團體內有他們自己的戲劇，自己的等級地位和個人重要性，有他們自己的蜚短流長，和成員之間許許多多的相互幫助……這些男人和女人在教會時，都感到自己在一個不那樣敵對的世界裡，有了一點某種地位（Thompson 1963: 440）。

因此，我們不可以忽視的一個問題是，宗教為同樣處於被剝削地位的中國農民工階級提供了怎樣的精神依託以面對生活中的不平等。然而把宗教看做一種心靈寄託還並不是理解宗教與民工主體性建構的核心維度。事實上，宗教在世俗世界裡作為一個意義的來源從來沒有消亡過，宗教幫助我們協商、調適現實生活的生存體驗，也就是說世俗世界需要宗教的介入（Asad 2003; Habermas 2008）。

在農民工研究「身分—政治」的敘事模式下，農民工的主體性建構實質是「一項努力應對、克服各種排斥力量而爭取承認的事業和進程」（王小章 2009: 134）。宗教信仰作為一種身分認同和歸宿的維度之介入，在農民工「爭取承認的事業和進程」中究竟發揮著怎樣的作用也是需要回答的問題。對於處於城市與鄉村、工人與農民、文明與非文明、剝削與反抗等多重身分差序的矛盾和衝突中的農民工群體，宗教如何作

為一種意義體系甚至是社會資源，賦予他們能動性以對世俗世界的體驗進行調適和協商，從而重構他們在被壓迫中的主體性？抑或是如E. P. Thompson所描述的，宗教恰恰成為了馴化工人的「道德機器」，使他們心甘情願地接受著工業資本主義的剝削。宗教的介入是否會使本來就處於階級與身分雙重壓迫下的農民工深陷身分差序的衝突之中？其中，已經有學者開始關注到農民工群體的宗教信仰問題，發現宗教不僅為農民工在邊緣化的社會結構中提供安慰和承認的「屬靈家園」（黃劍波 2009, 2012；Huang 2014），還可以成為他們獲取社會資源和權力的一種方式（Cao 2010），但同時其地位也是鑲嵌在一個「既納入又排除」的複雜關係中（黃克先 2015）。而本研究試圖將宗教與農民工主體性建構的關係放置在與民工生活體驗更密切的工業資本主義和公民身分問題下分析（即前文提出的「雙重剝削」），進一步探討農民工的宗教建構與工業社會秩序之間的動態結合或衝突。因此，本文的理論目標在於探討宗教信仰與農民工主體性的建構，尤其是農民工如何在多重身分差序的衝突中建構其主體性，並由此透視社會變遷背景下宗教、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秩序與民工公民身分之間的關係。圍繞這一目標，本文實證章節中首先討論宗教與全球資本在深圳的相遇如何導致了民工基督徒群體的興起，並對本研究的地方語境和研究對象進行說明（第三節）。其次分析民工在城市教會的宗教實踐，以及民工群體如何通過宗教提供的意義系統以逃避和調適工廠政體的剝削與邊緣的社會體驗（第四節）。並進一步從教會延伸到民工基督徒的生產領域，揭示了民工基督徒主體性的建構與工業社會秩序之間的緊張性以及宗教身分如何馴化了農民工群體的主體性（第五節）。據此進一步探討在結構性的剝奪下，民工基督徒如何尋求對公民身分的協商以及其在多重身分差序的矛盾中被進一步邊緣化（第六節）。最後，文章總結了基督教在民工「爭取承認的事業與

進程」（王小章 2009: 134）中所發揮的作用，並進一步討論了民工基督徒所折射的個體行動者宗教建構與廣闊的社會結構之間的衝突，以期對理解中國的宗教復興和社會轉型問題提供幫助。

三、深圳：民工基督徒興起的地方語境

民工基督徒在深圳已經成爲了比較常見的現象，這主要體現在深圳的城市教堂表現出日益明顯的「民工化」趨勢。對於深圳這個由移民組建的新型城市來說，外來人口（非戶籍人口），包括大量由民工組成的流動人口，已成爲了當前深圳人口的首要組成部分。根據2013年統計年鑒顯示，深圳戶籍人口爲310.47萬，而非戶籍人口則爲752.42萬，占總人口的70.8%。伴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大量的鄉村基督徒由鄉村遷移到城市，在城市中新近皈依的基督徒也大量湧現，共同改變著都市裡的宗教景觀，而這種改變更直接地體現在城市的教堂裡。在深圳，尤其是深圳關外的教堂中，民工基督徒已不僅僅是都市教會中的一個新生群體，而是蓬勃發展的主力軍，並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地方宗教的復興（朱竑、郭春蘭 2009）。由於關內教堂信教人口較爲龐大，難以統計，研究僅對寶安區、龍崗區和南山區4所教堂的外來人口（非戶籍人口）進行估算。表1可以看出深圳關外的3間教堂，非戶籍人口比例都在80%以上，其中根據研究者長時間的參與式觀察，這些非戶籍人口中大部分是在附近工作的民工。

表1 深圳市四間教堂外來信徒的比例

教堂	區位	外來人口比例 ¹ (%)
三祝里福音堂	寶安區	90% ²
基督觀瀾堂	寶安區	85% ³
督教平湖堂	龍崗區	80% ⁴
白石洲教會	南山區	70% ⁵

其次，農民工群體在深圳特定的社會情景下也有其獨特的生存體驗，這與深圳的經濟背景、城市政策、文化特質等因素息息相關。在深圳這個以「世界工廠」而著稱的城市，農民工作為跨國勞動力和廉價勞動力已被深深地納入到全球資本主義和全球新勞動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體系的管制之中（潘毅 2007）。深圳雖然長期宣傳著「來了，就是深圳人」的城市包容性，但另一方面卻依然緊緊依賴著「戶籍制度」，導致大量流動人口依然無法分享城市發展帶來的福利，並徘徊在城市生活的邊緣。在深圳1100萬的納稅者之中，只有14%本地戶籍人口享有公共福利。⁶ 例如潘毅（2007）指出，深圳政府對工廠日益擴張的宿舍勞動體制採取默許甚至支援的態度，因為這種體制在剝奪流動人口勞動力的前提下又可以達到對其暫時安置的目的。這種資本主義與地方政府的連袂實質上表明了農民工群體在深圳受到社會制度和全球資本的雙重壓榨。此外，深圳作為一個改革開放後迅速崛

¹ 本處外來人口指非深圳戶籍人口，與基督徒的出生地無關。

² 根據三祝里教堂2014年的統計，受洗的信眾大約為300人（除去流失信教徒，即不常來該教堂禮拜教堂），其中本地教徒大約為30人，估算而得。

³ 根據觀瀾教會在冊的受洗人數中深圳非戶籍人口的比例估算而得。

⁴ 根據平湖教會在冊的受洗人數中深圳非戶籍人口的比例估算而得。

⁵ 根據白石洲教會在冊的受洗人數中深圳非戶籍人口的比例估算而得。

⁶ 聯合早報，<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2/cnpol090707f.shtml>。

起的國際大都市，由於缺乏歷史和文化的「植根性」，其城市文化充斥著現代性的特質，因此作為城鄉之間的邊緣人——農民工——在城市空間下往往會形成「無根感」（sense of rootlessness）和「不確定感」（sense of uncertainty）等現代性體驗（Giddens 1991）。可以說，農民工在深圳的日常生活體驗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基督教在深圳的傳播和發展。雖然宗教活動有一定的敏感性，但深圳的工廠企業甚至是政府對基督教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採取默許的態度。例如有報導稱，2010年富士康發生連環跳樓事件後，其創始人郭台銘甚至邀請牧師入駐廠區以解決基層員工的心理問題。⁷

為研究深圳民工基督徒具體的生活實踐和主體性建構，研究者於2015年2月到5月間對深圳的教堂、工廠和社區等進行了田野調查，並選取了30名正式洗禮的基督教新教教徒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研究者首先對民工基督徒的工廠、宿舍和教堂等生產生活空間以及禮拜、聚會和禱告等宗教實踐進行了深入的體驗式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此外，研究者還對30位民工基督徒進行了深度訪談。作為一個個案研究，訪談對象的選取並不尋求統計學意義上的代表性，而是考慮深圳民工基督徒群體的典型性和多樣性（王寧 2002），以期對深圳民工基督徒這一特定群體的宗教生活狀況以及如何理解這一群體的主體性建構進行深入的分析。因此研究對象主要集中於流動人口和工業區密集分佈的深圳關外教會，如寶安區的三祝里教會和觀瀾教會，龍崗區的平湖教會都鑲嵌在密集的工業區之中，分佈著諸如富士康等大型工業企業。由於研究對象為民工基督徒，所以全是農村戶籍人口，主要來自河南、安徽、四川、浙江、陝西、河北、湖南、湖北和廣東等省份，學歷為小學和初中

⁷ 財經天下，〈富士康的夜活——基督教唱詩班〉，<http://www.txweekly.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4&id=1521>。

為主，大部分從事工廠工人、建築工人或服務業相關行業。其中男性16人，女性14人，18人在家鄉就開始信基督教，年齡由19歲到57歲之間。訪談時間為40分鐘到3個小時之間。

四、都市里的鄉村教堂：情感空間的營造與現實社會的逃避

（一）教堂作為情感空間的營造

對於移民信徒來說，教堂往往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異鄉的家」，這種「異鄉的家」一方面可以維繫原來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又能促進對遷入地的歸宿感和新的身分認同的生產（Ley 2008）。而本研究在對民工基督徒的研究中發現，教堂對他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承載著宗教神聖性的空間，還是一個被賦予了信仰依戀感的情感空間，是他們生產歸屬感和身分認同的場所。教堂對民工來說主要有以下功能和意義：（1）宗教功能：禱告、讀經、朝拜和聚會；（2）社會支持；（3）精神和情感的家園。

首先，教堂的禱告、讀經、朝拜和聚會是基本的宗教功能，它們從宗教儀式上為民工的宗教信仰提供依託，並通過儀式不斷強化信仰。除了主日活動，深圳的教堂還組織青年團契、婦女團契甚至以「地緣」為關係的聚會。教堂的宗教功能另一方面又為來到城市的鄉村基督徒提供了異鄉的「精神據點」，為他們延續甚至是強化自己的宗教信仰提供了空間上的依託。其中一位鄉村基督徒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工廠裡工作，附近找不到教堂總感覺不踏實。我是聽老鄉（基督徒）說的才找到這裡（觀瀾堂）。在農村的時候，村子裡就有教堂，除了農忙的時候，都會經常去……來到深圳想起來的就是想到這邊的教堂看看（裝配工人阿龍，男，2015年3月）。

對於鄉村基督徒來說，由於宗教信仰的驅動，他們都有主動尋找教堂的需求。教堂的存在本來就意味他們在異鄉可以「感到更踏實」。值得指出的是，與城市基督徒不同，民工基督徒往往運用「鄉村化」的宗教敘事（religious narrative）方式參與到教會的宗教活動之中。對於鄉村基督徒和在城市皈依的民工基督徒，由於文化水準的限制，他們對基督教教義和聖經的解讀往往比較淺薄，更多是以感性的和故事的方式呈現。在三祝里教堂的一次團契活動中，一位河南女教徒被請求發表學習聖經出埃及記「十戒」一小節後的感想，但她的發言卻在講述自己和家人的神跡事件和主如何支撐她渡過困難的生活，言語中還有半點語無倫次，遠遠背離了主禮要她發言的初衷。但她並不擔心會有多尷尬或遭到別人的取笑，因為這種鄉村化的宗教敘事早已被教會接納和理解。Jon Bialecki（2011）曾指出兩種截然相反的基督教信仰形式和意識型態：一種是內向的、感性的和以實踐（practice）為核心的形態，另一種是外向的、理性的和以文本（text）為核心的形態。前者更接近中國的鄉村或社會底層的教徒，而後者則與城市中產階級基督徒更相近。這兩種信仰形態在深圳很多的教會中都能和諧共存，鄉村化的宗教敘事方式並不會受到排擠，這使民工基督徒至少在信仰不會在鄉村差異中掙扎。

此外，教堂還是基督徒尋求心理庇護和社會支持的場所。教堂為農民工信徒（但也不限於信徒），特別是剛到城市打工的信徒提供社會支

援，這種支援更多體現在民工基督徒之間的相互幫助，包括工作機會的分享，甚至幫助找工作，提供租房資訊等。民工阿東為河南鄉村的基督徒，原來在廣州做建築工作，春節返鄉歸來後來到深圳找工作。在找工作多日未果後，由於身上攜帶的錢不多，他從住旅店變為在街邊露宿。不幸的是他在街邊露宿時把行李和身分證丟失，於是向教堂（三祝里堂）尋求幫助：

前幾天我把行李丟了，身分證也在裡面。於是我一邊走一邊找（工作），在工地裡轉，看看哪個工地要散工，先找著一份工做一兩個月，賺夠錢了再回去把身分證辦了。但沒有身分證不好找，我一個人來的，也沒有老鄉做擔保，都很難找到。我只能走到哪裡是哪裡，晚上我就在工地找個遮蔽的地方過夜。這幾天我一邊走一遍禱告，人不可能困難一輩子的，會變好的。今天上午，看到路邊有個十字架的牌子，於是我就找到了這間教堂。他們說幫我在附近的工廠找一份工作（建築工人阿東，男，2015年3月）。

教堂的黃事務和李弟兄（教堂青年團契的組織者）立即為民工阿東提供了幫助，托另一在工地上認識人的民工教徒為他尋找工作，並將教堂捐贈的衣服給予受難民工。宗教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力量把處於社會邊緣和弱勢地位的農民工群體連接起來，讓他們在困難中可以相互扶持。這種社會支持不是社會的救助而是弱勢群體內部群體性的構建。

這種群體性的構建還體現民工基督徒在教堂這一空間下的日常生活和實踐。如教會的義工大多為年輕的民工群體（粵語中的「打工仔」、「打工妹」、「廠妹」），他們對教堂的事務充滿熱情。2013年開始，

三祝里教堂開始為方便主日遠道而來參加活動的信眾，開始在教堂裡籌建飯堂，而這一工作的籌備和維持都是由年輕的民工（青年團契的成員）負責。其中一位年輕民工的姊妹帶領參觀教堂時坦言：「我都來這間教堂好幾年了，對這裡清楚的很，都把這裡當家了。也沒有什麼拘束，這裡的義工都是很多和我一樣在附近打工的」（超市收銀員曉芳，女，2015年5月）。可以說，教堂一定程度上被賦予了「工人階級」的色彩，當然這並不說明宗教有利於構建階級意識的形成，而是他們對具有相同經濟背景和共同信仰的群體內部的高度認同。民工基督徒群體通過日常生活的實踐，形成了群體記憶所承載的群體文化、群體風格和群體社會表徵，從而為民工基督徒的身分認同和群體認同清晰地描繪了群體的符號邊界（方文 2005）。另一方面，民工基督徒又通過群體的實踐，將教堂這一宗教空間賦予強烈的情感和依戀，並構建起教堂作為維繫認同和生產歸宿感的「情感空間」。這種「情感空間」的構建也正是民工群體在邊緣中構建主體性的策略。

（二）宗教與社會現實的逃離

對於民工基督徒來說，教堂的門內和門外似乎是兩個世界。走出教堂這個神聖空間，他們不得不面對受現代性的侵蝕而日益世俗化的社會：一方面是緊張的工廠工作、重複乏味的流水線、生產指標的壓力等工廠政體（factory regime）的壓迫，另一方面卻是微薄的工資，漂泊異鄉的疏離感和城市社會的歧視。可以說，農民工作為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產物，又是對社會轉型深刻的體驗者。他們深受資本主導下的生產和管理制度的束縛，在深圳成為資本再生產的管道與機器。在這個程度上來說，教堂對民工基督徒來說就不僅僅局限於信仰層面，它更是一個逃

離社會現實，尋找心理歸宿的場所。另一方面，中國的社會轉型正在經歷現代性社會轉型的過程。在現代性社會，任何意義與認同都是不穩定的，因此，人們常常感到生活失去確定性（Giddens 1991）。對民工群體來說，更是如此，他們不但受到制度性的歧視，而且還收入低微，處於社會的弱勢地位。他們生活往往是缺乏安全感的，更不用說在此基礎上建立穩定的身分認同。但宗教卻為他們身分認同的構建另闢蹊徑。民工基督徒小傑的經歷，典型地闡明了宗教信仰以及教堂這一空間對這一群體的意義：

我在惠州市讀的大專，是讀財務管理的，但是我去了好多間公司他們都不要我，不信任我，他們說要實實在在懂得這些東西的，沒有經驗更加難找工作。後來我做了好幾份工作，在東莞做過保安，後來到深圳工廠工作，然後近幾年我信主了，以前我父母信，但我不信，現在我也開始信了……也挺大壓力的，特別是趕產量，趕不晚要被上司罵。但信主之後，我無所謂了，他罵他的，我做我的，反正我也盡力了，工作上確實是很乏味。在深圳，我每走到一個地方要先到教堂去，他們都信主，我很開心啊。在沒有來到教堂之前，感覺自己就處於那種漂浮的狀態，所以先到教堂，人才能在教堂（不漂浮），所以我今天才來這裡（工人小傑，男，2015年5月）。

小傑的「漂泊」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轉型時期農民工真實的生活狀況：生活就像一場永久的博弈，很難穩定地從事一份工作。這對農民工來說更是如此，在不同的工作間漂泊，在不同的工廠間漂泊，在不同的城市間漂泊，他們必須在這個複雜多變的社會中不停地摸索。無論是

「漂泊」，還是「趕產量」，都是民工社會體驗的真實寫真，這種體驗也解釋了農民工為什麼會尋求「上帝」的庇護。雖然宗教能給他們因為對複雜社會現實產生的風險和不穩定性提供心靈的慰藉和信仰上的支援。事實上，宗教為他們逃避與調適「工廠政體」提供了一個心靈的路徑：「他罵他的，我做我的」、「每走到一個地方要先到教堂去」；這都說明宗教信仰是能夠讓他們暫時抵抗或中和負面的生存體驗的途徑。對於民工小傑，宗教信仰是否能使他的生活達到「本體論的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Giddens 1991）的狀態，研究者暫時無法確定，但至少當他踏進教堂的時候能達到一種穩定的歸宿感和安全感。

五、神聖與世俗之間：資本的規訓與宗教意識

（一）資本的工人vs上帝的工人

對肉體的政治干預，按照一種複雜的交互關係，與對肉體的經濟使用緊密相連，肉體基本上是作為一種生產力而受到權力的支配和干預；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它被某種征服體制所控制時，它才可能形成一種勞動力（在這種體制，需要也是一種被精心培養，計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只有在肉體既有生產能力又被馴服時，它才能變成一種力量。

——米歇爾·福柯（轉引自潘毅，2007）

對於民工基督徒這個身分，隱藏著內在的衝突性，首先既是「民工」又是「基督徒」，這也意味著他們既是上帝的工人，更是資本的工人。的確，他們要存活就必須首先成為具有生產能力的勞動者，就必須

接受資本對身體的規訓。具體到工廠這一空間，隱藏包括崗前培訓、工廠紀律、生產定位、時間表和獎懲機制等一套完整規訓權力和技術，使工人的身體成爲被馴服的生產力。傅柯（1977）將這種規訓技術稱爲「權力的微觀物理學」。不得不承認，宗教信仰只是讓他們的心靈得到釋放，他們的身體依然是深受資本和規訓的束縛。

然而，「上帝的工人」和「資本的工人」最大的衝突還是在時間上。工廠裡緊張的工作安排，讓他們很難有去教堂的時間，特別是遇到週日加班的情況，很多工人只能隨機、有選擇地參與教會的活動。來自江西的女工阿慧在家鄉就是虔誠的基督徒，在家鄉受洗。她說，過去在家裡有再大的事週末也要停下來到教會去。由於工作時間緊張，她只能每天在宿舍做幾次禱告而已。她身邊一些一起來打工的弟兄姊妹，由於時間忙碌再加上對基督教認識程度就不深，漸漸脫離了教會，無疑對她的信仰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和威脅：

最煩惱的就是爲了趕進度，（工廠）連續幾個星期不放假。又是很想到教堂裡，可是真的沒有時間，沒辦法，我首先要賺錢養活自己。有時工作實在太累了，放了半天假就倒頭大睡了，也沒有精力去教堂。只能在宿舍禱告，請求主原諒自己的罪惡……工廠是有嚴格的制度的，就算是離崗小便也要拿著離崗證。請假是很難的事情，如果你離開了半天，不僅主管罵你，同一條線上的人也會罵你（工廠工人阿慧，女，2015年4月）。

的確，宗教的時間與資本規訓下的時間是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的。在社會學家E. P. Thompson（1967）的著名論文“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中，他認為以秒為基數的時間（clock-time）是工業革命和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後果，並不是人類原始的時間感知。在中國改革開放早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金錢」的觀念最先在深圳開始流行。時至今日，這種資本主義時間觀念與現代工廠的規訓技術相互結合，並形成一套完善的時間制度體系。

無論是身體還是時間，民工都深陷資本的規訓中。對很多虔誠的民工來說，特別是那些來自鄉村的資深基督徒，缺乏儀式的宗教信仰對他們來說夾雜著矛盾與不安。他們的身分認同也是在這種衝突的形式中建構的，他們的理想是做上帝的工人，而現實不得不接受他們是資本的工人。

（二）宗教身分的展演與道德的機器

雖然民工基督徒的宗教主體性受到了工業資本主義工廠政體（factory regime）的限制，但他們並不完全是消極接納者。民工基督徒會通過宗教賦予他們的資源，尋求在工廠這一高度管制的空間下展演和建構自己的宗教身分。但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宗教身分的展演和建構雖然為他們表達和實踐宗教信仰創造了條件，但卻催生和強化了一種「道德的機器」，使他們無意識地接受著工業資本主義的馴化和剝奪。

首先，他們對自己基督徒的身分是毫無隱藏的，雖然他們是工廠裡的少數。不但如此，他們還以一種展演的方式對自己的身分進行宣誓並主動地建構基督徒的形象。在工作上，他們會以作為一個基督徒的「本分」要求自己，並在工廠裡積極地構建一個刻苦、勤勞、善良和值得信任的基督徒形象。三祝里教會的黃主事十幾年前就從家鄉四川來到深圳打拼，並很快在教會的引導下接受了基督教洗禮，是民工基督徒中信仰

十分虔誠的「元老」之一。在2012年被全職聘為三祝里教堂的主事之前，他一直在周圍的工廠工作。他闡釋了在工作中何為一個基督徒的「本分」，他認為無論是做計時還是計件的工作，上司有沒有在監督，他們都應該盡力做，因為這是做給神看的，將來還要在上帝面前交帳。黃主事雖然期間變換了多間工廠，但無論在哪間工廠他都能得到上司的賞識，甚至還被點名要他做某個工種的組長。另一方面，民工基督徒還會通過身分的展演以獲取工廠其他工人的信任，以踐行基督徒作為「好人」的形象，例如主動承擔更多的任務以減輕工友的壓力，甚至幫工友代班。在對非基督徒民工訪談中，他們對認識的基督徒的描述往往是「不騙人」、「很信得過的人」。三祝里教堂的黃主事描述了他在工廠打工時採取的策略：

當你想在工廠過得好過點，你就要表現出一個基督徒應該的樣子，努力工作，和善地對待自己的工友和領導，讓他們信任你，覺得你信主是一件好事，他們才會覺得，哦，原來信主的人是這樣的……我在兩間廠工作過，老闆都非常信任我，覺得我人很真誠，還讓我做了組長……開始時請假他們都是不給的，我說我去做禮拜，可不可以換一下班，主管都不批給我，後來他們逐漸認識我了，也對信主的人有了些瞭解，覺得還是有信仰的好啊，是好事。後來我請假，有一次，主管很默契，連我妻子的請假條也一起開了（黃主事妻子也是基督徒）（三祝里教堂黃事務，男，2015年2月）。

其實，民工基督徒對自己身分的展演是一個在工廠這個高度管制的環境下尋求宗教主體性的策略。這種身分的展演一方面是宗教信仰的驅

使，另一方面又是為處於弱勢地位中的自己爭取權利甚至是「特權」。此外，部分民工基督徒會以傳道（傳福音）這種直接、主動的方式展演作基督徒的主體性，以此應對資本的規訓。對於基督徒來說，傳道（傳福音）本來就是一種對上帝的義務，然而在高度機械化和世俗化的工廠，傳道更像是一種對世俗空間的改造。而且傳道的過程也是民工基督徒強化自己宗教信仰和再生產身分認同的途徑。如民工富強對傳福音表達了這樣的想法：

我看見我同工廠裡的很多人都很苦惱，每天趕貨趕貨，有些不太機靈的還經常被罰錢。我想，就給他們傳福音吧，讓他們也信主。信主了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經常煩惱了。如果工廠裡的弟兄姊妹多了，工廠就不會這樣死氣沉沉的了（工廠工人富強，男，2015年6月）。

在民工基督徒看來，勤奮工作甚至超額完成工作都是他們的「本分」，是一個基督徒理所當然應盡的責任。不但如此他們還希望其他工人也能像基督徒一樣踏實工作，就不會再「經常煩惱」。事實上，基督教信仰並不能改變他們被剝削的現狀，但卻可以為他們應對勞動剝削提供一個心靈調適的途徑，讓他們順從於工業資本主義的剝奪。值得指出的是，基督教不但不能成為他們爭取權利和資源的工具，相反基督教在工作上對他們的道德約束反而迎合了工廠政體和工業資本主義的需求。這與E. P. Thompson（1963）描述的十八、十九世紀循道衛教（Methodist）在英國新興工人階級傳播和發展的景象十分相似。他認為循道衛教的至關作用在於使工廠工人們養成規則、紀律與服從的習慣，並讓他們心甘情願地成為「出賣自己勞動的奴隸」。如E. P. Thompson

(1963: 362) 所言，當紀律成爲一種宗教美德被灌輸到虔誠的信徒時，「同廠主的機器原理一樣可靠的廠主的道德機器」也得到了創立。當基督教復與工業資本主義在深圳再次相遇，深圳的民工基督徒一定程度上重複上演了英國十八、十九世紀工人階級的宗教景象，也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韋伯對清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相互促進的論斷。一方面，深圳資本主義發展帶來急劇的工業化和世俗化反而凸顯了宗教作爲一種意義來源和心靈調適途徑的重要性，世俗世界需要宗教對人生活體驗的調適。另一方面，基督教教義及其道德約束一定程度上穩固了工人—資本家之間的階級關係，爲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民工基督徒特別注重對基督教義中「本分」、「將來在上帝面前交帳」、「人在做，神在看」等教義的解讀，並將它們踐行到工作中。如E. P. Thompson所言宗教以一種「道德機器」和「內在強制」的方式提高工人的勞動強度和生產率。與曹南來(Cao 2010)對溫州基督教會中民工群體的研究不同，溫州民工基督徒在宗教實踐，特別是與老闆基督徒的社會互動中，獲取了自我實現和向社會上層流動的資源，基督教給予他們的是一種地方的社會權力和資本。但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占主導的深圳，民工基督徒的宗教和主體性建構則呈現出不同的景象：基督教確實賦予了民工基督徒一定的能動性讓他們調適和應對勞動剝削，但在強大的工業資本主義機器的型塑下，他們無法改變被壓迫的主體性。

六、「多重邊緣人」：宗教與「農民工」身分認同

(一) 宗教、素質與公民身分

在中國社會，最容易與農民工相關的一個詞當屬「素質」。「人口

素質」在中國七十年代是用來描述人口的話語，與計劃生育政策和改革開放後急劇增加的流動人口息息相關。在官方主流的話語中，農村地區廣大的「低素質」人口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阻礙（Amongst 2004）。所以，農民工群體也常常被貼上「低素質」的標籤，從而理所當然地成為廉價格勞動力。這種國家和社會對農民工群體施加的「低素質」的身分標籤，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民工的「想像共同體」並被農工群體所內化，成為用來自我定義的話語。而且這種身分標籤會在城市這一場域下以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形式得以具體施展。對於城市本地居民來說，這種素質的標籤是區分市民和農民工重要符號邊界，也是農民工在城市社會遭遇排斥和歧視的重要原因。

然而，作為民工基督徒群體，他們並不樂意接受「低素質」這樣的標籤。事實上，「素質」在民工基督徒的身分認同構建中處於非常微妙的關係。首先，他們認為宗教信仰以及對教義的遵守能讓他們洗脫罪惡，成為一個有「素質」的人，讓他們與其他不信教的農民工所有區別。但這種身分認同的再談判也有一定的排他性，即強調作為基督徒身分認同。當民工基督徒作為「基督徒」這一群體時，素質卻成為了民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民工身分邊界的符號。他們會以宗教為身分認同的工具，尋求在農民工的內部建立差異性：

我覺得我是有信仰的，我和他們（其他民工）還是（有）不同的地方，起碼我不會滿嘴粗口髒話，不賭牌，也很少抽煙喝酒，每次聽見他們講粗口我就會感到很不舒服……（其他民工）他們很多都是忙忙碌碌，不知自己為什麼活著（保安阿武，男，2010年3月）。

但是即使他們信仰宗教，仍逃離不了城市居民對他們的歧視，也就是說「農民工」和「低素質」是他們無法擺脫的社會標籤。如民工李輝對在城裡遭遇的歧視表示出了無奈：

有一次去做裝修，那個屋主一直叫我們做這做那，態度不好不說，還老覺得我們會偷工減料，騙了他們。在他們眼中我們就是素質很低的人，就該幫他們幹這種活的。還有一次房東放在外面的東西不見了，也是懷疑我們拿走了，我當時就受氣……我們信主的人是從來不會做這種不道德的時期的，我們生前都要洗清自己的罪惡，才能在上帝面前交代（裝修工人李輝，男，2015年3月）。

也就是說，民工基督徒主體性的建構也是一個不同身分的取捨過程，即對基督徒身分認同的強調和對主流話語中農民工身分的部分捨棄。在這個層面看，信仰本身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它讓民工基督徒運用宗教提供的一套價值和意義系統為準繩，去區分和描繪「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群體邊界。這種取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工基督徒對城市公民身分的渴望，但即使如此他們仍無法掙脫城市與鄉村之間文明與非文明的話語的束縛。

（二）「多重邊緣人」：民工基督徒身分認同的困境

民工基督徒又同時負荷著「多元群體成員資格」（方文 2008），是多重身分的集合。如果說農民工本來就是城市的邊緣群體，那麼民工基督徒就是夾雜在民工和基督徒、城市與鄉村、上帝與祖先、神聖與世俗

等身分中的「多重邊緣人」群體。雖然他們會在農民工群體中尋求內部的差異性，主動建構宗教身分認同，但研究發現他們對自我身分的認知是鑲嵌在「農民工」這一身分之下的。也就是說，即使宗教參與了他們身分認同的構建，他們既無法也不能拋棄「農民工」這一身分，農民工這一身分是他們對現實生活的真切體驗，是他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實實在在的身分：

我當然還是一個打工的，從農村來的也就是農民工。雖然說主面前人人平等，但現實面前還能真正平等嗎？比如說，你開你的寶馬車，我是一個打工仔。雖然在教堂裡我們都是弟兄，但出到教堂外，我能天天開著你的寶馬去溜達嗎？……我覺得我跟他們（其他民工）的處境是一樣的，只不過我有信仰，心裡可能會踏實一點（推銷員阿峰，男，2015年3月）。

在教堂裡是認識了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些是在城裡的，比較有知識文化，比我們懂得很多。有時團契的時候，讓我講話，我也不知道講什麼，但他們（城市基督徒）十分懂得。平時基本跟老鄉和熟悉的人在一起，跟他們（城市基督徒）雖然認識，但不是同一個生活圈子的……走進教堂，大家都是平等的，但走出教堂你還是一個外來打工的（工廠工人麗燕，女，2015年4月）。

民工阿峰和麗燕則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自己作為「農民工」仍是社會的邊緣群體。作為城市裡的陌生人和漂泊者，他們覺得深圳只是一個落腳之處，無法拋棄農民工的帽子去融入這個城市。值得指出的

是，民工基督徒能在教堂這一空間下建立歸屬感，卻不能將其上升為對城市的歸屬感。因為教堂本身就是一個差異化的空間，雖然民工基督徒占很大比重，但對於改變宏觀的社會結構與權力結構畢竟是無能為力的。換而言之，教堂在一定程度上仍維繫著城鄉之間的差異。這個層面上，宗教能給他們帶來的只是心靈的慰藉，但卻無法給予他們城市的歸屬感和市民感（sense of citizenship）。不但如此，部分民工基督徒的身分還在主流社會凝視下進一步被邊緣化和「他者化」。例如很多民工基督徒常常會面臨著基督信仰與地方信仰的矛盾、「洋教」論斷等困惑。一位元來自廣東潮汕地區的女工就面臨著這樣的困境：

我家裡都是拜老爺（潮汕地區的各種神靈）的，他們很反對我信這個……現在父母都不愛和我說話了，對我很生氣。親戚朋友也說我，他們覺得我信的是外國人的東西（工廠工人小婷，女，2015年6月）。

顯然，在民工和基督徒、城市與鄉村、文明與非文明、工人與資本家、上帝與祖先、神聖與世俗、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等多重身分差序的衝突和束縛中，農民工不但不能通過宗教實現對主體性的全新構造，反而在結構性的差異陷入城市社會「多重邊緣人」的體驗。宗教確實賦予了他們一定的協商策略，但卻無法讓他們擺脫多重身分差序對他們主體性的壓迫。

七、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探討了深圳市民工基督徒的宗教實踐和

主體性建構。民工基督是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的特殊產物，是在當前中國急劇的城市化進程和宗教復興相互交織作用下形成的「新興群體」。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圳的教堂正在經歷著一個「民工化」的趨勢，民工基督徒群體已逐漸成為教堂的新興主力軍，並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城市宗教景觀。雖然農民工受到社會制度和全球資本的雙重壓迫並被建構為邊緣的社會類別，但作為民工基督徒他們並不是消極地接納社會現實的安排，而是以宗教提供的符號系統積極主動地構建生活的意義以及主體性和身分認同，從而在「斷裂的社會」中實現自己的生存策略。正如 E. P. Thompson 所強調的，我們不能忽視「工業化」過程中工人階級主體性的質變過程以及工人社會或文化的能動性，而簡單地將階級看做一個社會經濟結構的決定物。隨著工業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深入發展，中國工人群體的主體性已不簡單是「剝奪—抗爭」中的階級意識形成問題，而是鑲嵌在具體社會文化情境中的「爭取承認的事業與進程」（王小章 2009: 134），其中宗教就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從深圳民工基督徒的經驗研究看，宗教與工人主體性和身分認同建構是一種衝突與協商的關係：一方面，宗教確實給予了農民工一個應對現實社會的生存策略，無論是在教會中獲取心靈和情感的庇護還是對工廠政體的逃避與調適；但另一方面，在社會結構性的差異下他們仍然無法通過宗教實現對主體性的全新重構，宗教既不能增強他們的階級意識又不能增強他們公民身分，不但如此還使他們在「多重邊緣人」的身分中進一步被邊緣化。與黃克先（2015）對農村移民宗教生活的研究相似，本研究發現雖然民工基督徒渴望通過宗教重構主體性，但他們的身分依然無法逃脫次等的身分差序（既黃克先所言的「模範—次等」的上下階序）。這種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恰恰反映的是中國社會轉型與農民工宗教建構之間、宗教與工業社會秩序之間的緊張性——個體行動者試圖通過宗教進行主體性的建

構，但卻無法逃離強大的資本主義社會機器的型塑。而對於民工基督徒來說，這種衝突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植根於「農民工在目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框架中，同時遭受著階級與身分的雙重剝削」（吳介民 2011: 51）。首先，在工業資本主義和階級結構的強大制約下，基督教在民工階級之間的建構不但沒有形成顛覆性的力量或強烈的階級意識，反而成為了如E. P. Thompson 所言的維護工業社會秩序的「道德機器」。正如前文「神聖與世俗之間」一節所描述的，民工基督徒對工廠政體的協商反而使他們以一個基督徒的「本分」，踏實地工作在充滿壓迫的工廠中。其次，在城鄉二元體制下，公民身分差序仍是農民工無法逃離的社會現實。民工基督徒的生活體驗被包含在城市—鄉村、資本家—工人、文明—非文明、神聖—世俗等多重身分差序的矛盾之中，並限制了他們通過宗教對主體性的重構。即使戶籍制度完全被廢除，這種社會文化的分異並由此衍生的社會等級制度（social hierarchy）也很難在短期內消失。但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民工基督徒卻依然安分地接受著國家社會制度和工業資本的雙重剝奪？也許宗教作為一種可以對生活世界中不安和不確定性提供解釋的象徵體系，使得生活中的苦難成為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社會現實（Geertz 1999）。也正是因為如此，深圳的教會、政府與企業之間似乎形成了某種默契，為基督教在深圳的發展以及民工基督徒群體的興起提供了土壤，因為宗教不但沒有形成顛覆性的力量，反而維護了深圳工業資本主義的秩序。這種現象也是宗教復興在深圳的一種地方性響應。但本文對農民工宗教信仰的研究尚未涉及基督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例如佛教和伊斯蘭教信仰的工人，他們在工業資本主義的體系下是會有怎樣不同的體驗？民工基督徒身分認同的衝突是否也存在於其他宗教信仰的工人中？缺乏不同宗教之間的對比是本研究其中一局限之處。與基督教不同，佛教更注重個人的精神感受或心靈體驗，這

也導致佛教的個人信仰和佛教團體之間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也就是李向平（2004）所言的「信仰但不歸屬」的佛教信仰形式。這種缺乏清晰的「符號邊界」信仰形式或許並不會像基督教一樣與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存在著緊張性。

民工基督徒的經驗研究也為思考中國的社會轉型提供了一個視窗。中國由鄉土中國向現代性中國轉型過程中經歷的急劇社會變遷，不僅是工業資本主義對日常生活的重組，還是文化、情感和制度上的斷裂，也正是由於社會的斷裂及社會關係的重組為個體行動者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並選擇信仰的契機。這也不難理解為何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國近二十年的復興。但基督教在中國不能簡單理解為西方宗教的一套價值和信仰體系，它更多是社會行動者在具體社會情境下對生活意義和身分認同的建構。因此，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個體如何通過宗教建構自身的生活意義和身分認同，以及其與社會結構和社會權力之間的衝突應該成為被深入研究的話題。

作者簡介

高權，英國紐卡斯爾大學人文地理學博士研究生，華南師範大學文化產業與文化地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研究領域為宗教社會學、情感地理學與空間計量。現階段研究主題為微觀視角下城鄉移民的研究，以及中國的世俗化。在《地理研究》、《經濟地理》、《人文地理》等期刊發表論文數篇。

錢俊希，中山大學區域與城鄉規劃學士，英國愛丁堡大學人文地理學博士，香港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文化地理學與城市公共空間研究，在*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Geoforum*等國際重要期刊發表論文二十餘篇。

參考書目

- 王小章，2009，〈從「生存」到「承認」：公民權視野下的農民工問題〉。《社會學研究》1: 1-18。
- 王寧，2002，〈代表性還是典型性？——個案的屬性與個案研究方法的邏輯基礎〉。《社會學研究》5: 123-125。
- 王曉朝，2009，〈現代社會與宗教發展的趨勢〉。《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6(5): 63-75。
- 王漢生，劉世定，孫立平等，1997，〈「浙江村」：中國農民進入城市的一種獨特方式〉。《社會學研究》1: 58-69。
- 方文，2005，〈群體符號邊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體為例〉。《社會學研究》1: 25-59。
- ，2008，〈群體資格:社會認同事件的新路徑〉。《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5(1): 89-108。
- 石長慧，2010，〈城市更好：流動少年的身分認同與群體偏好〉。《中國農村觀察》3: 2-12。
- 池子華，1998，〈中國「民工潮」的歷史考察〉。《社會學研究》4: 102-111。
- 李向平，2004，〈「信仰但不歸屬」的佛教信仰形式——以浙閩地區佛教的宗教生活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1: 44-60。
- 李強，1995，〈關於城市農民工的情緒傾向及社會衝突問題〉。《社會學研究》4: 63-67。
- 李培林，1992，〈另一隻看不見的手：社會結構轉型〉。《中國社會科學》5: 3-17。
- ，1996，〈流動民工的社會網路和社會地位〉。《社會學研究》4:

42-52。

任焰、潘毅，2006，〈宿舍勞動體制：勞動控制與抗爭的另類空間〉。
《開放時代》3: 124-134。

朱竑、郭春蘭，2009，〈本土化與全球化在村落演化中的回應——深圳
老福音村的死與生〉。《地理學報》64(8): 967-977。

余曉敏、潘毅，2008，〈消費社會與「新生代打工妹」主體性再造〉。
《社會學研究》3: 143-171。

宋林飛，1995，〈「民工潮」的形成、趨勢與對策〉。《中國社會科
學》4: 78-91。

吳介民，2011，〈永遠的異鄉客？公民身分差序與中國農民工階級〉。
《臺灣社會學》21: 51-99。

郭於華，2007，〈轉型社會學的新議程——孫立平「社會斷裂三部曲」
的社會學述評〉。《社會學研究》6: 195-211。

孫立平，2003，〈斷裂：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5，〈社會轉型：發展社會學的新議題〉。《社會學研究》1:
1-24。

——，2006，〈《博弈：斷裂社會的利益衝突與和諧》〉。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

——，2009，〈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及其分析模式的轉換〉。《南京社
會科學》5: 93-97。

陳映芳，2005，〈「農民工」：制度安排與身分認同〉。《社會學研
究》3: 119-132。

- 唐燦，1996，〈性騷擾：城市外來女民工的雙重身分與歧視〉。《社會學研究》4: 117-126。
- 陳敬慈，2012，〈勞工，資本與國家：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中國勞資衝突〉。《臺灣社會學刊》50: 165-204。
- 梁永佳，2015，〈中國農村宗教復興與「宗教」的中國命運〉。《社會》35(1): 161-183。
- 費孝通、劉豪興，2011，《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
- 黃平，1997，《尋求生存：當代中國農村外出人口的社會學研究》。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
- 黃克先，2015，〈區隔但交纏互賴的信仰復振：中國城市教會中農村移民的宗教生活〉。《臺灣社會學》30: 55-98。
- 黃劍波，2009，〈「承認的政治」與信仰生活——以一個民工基督教會為個案〉。《基督教思想評論第十輯》，頁291-298。
- ，2012，《都市里的鄉村教會》。香港：道風書社。
- 梁麗萍，2006，〈社會轉型與宗教皈依：以基督教徒為物件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 72-81。
- 項飆，2000，《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三聯書店。
- 蔡昉，2000，〈中國城市限制外地民工就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人口科學》4: 1-10。
- 楊慧瓊，2012，《新時期的漂泊敘事和現代性體驗》。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
- 潘毅，2007，《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香港：明報出版社。
- 潘毅、盧暉臨、嚴海蓉等，2009，〈農民工：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開放時代》6: 5-35。

潘毅、盧暉臨、張慧鵬，2010，〈階級的形成：建築工地上的勞動控制與建築工人的集體抗爭〉。《開放時代》5(5): 5-26。

盧暉臨、潘毅，2014，〈當代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身分認同、情感與集體行動〉《社會》34(4): 1-24。

Anagnost, Ann, 1994, "The Politics of Ritual Displacement." Pp. 54-221 in Keyes Charles and Laurel Kendall (ed.) *Asian Visions of Authority: Religion and the Modern Stat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nagnost, Ann, 1997, *National Past-times: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Moder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Anagnost, Ann, 2004, "The Corporeal Politics of Quality (suzhi)." *Public culture* 16(2): 189-208.

Asad, Talal. 2003, *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 Christianity, Islam, modernity*. Redw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ys, Daniel H., 2003, "Chinese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oday." *The China Quarterly* 174: 488-504.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Beckford, James A., 2003, *Social Theory and Reli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alecki, Jon. 2011, "No caller ID for the soul: demonization, charisms, and the unstable subject of Protestant language ideology."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4(3): 679-703.

Cao, Nanlai. 2010, *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 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 Redw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 Jenny, and Ngai Pun, 2010, "Suicide as protes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Foxconn, global capital, and the state."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37(2): 1-50.
- Chan, Kam Wing, Li Zhang, 1999,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changes." *The China Quarterly* 160(1): 818-855.
- De Certeau, Michel, 1988,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Living and cooking*. Volume 2. Vol. 2.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ubuisson, Daniel, 2003, *The Western Construction of Religion: Myths, Knowledge, and Ideology*.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Fitzgerald, Timothy, 2000, *The Ideology of Religious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 Geertz, Clifford著，納日碧力戈等譯，1999，《文化的解釋》。上海：人民出版社。(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Vol. 5019.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Redw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One: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2008, "Notes on post-secular society."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25(4): 17-29.

- Huang Jianbo, 2014, "Being Christians in Urbanizing China: the Epistemological Tensions of the Rural Churches in the City." *Current Anthropology* 55(S10): S238-S247.
- Hunter, Alan and Kim-Kwong Chan, 2007,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1997,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London: Penguin Books India.
- Fiedler, Katrin, 2011, "China's 'Christianity fever' revisited: Towards a community-oriented reading of Christian convers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39(4): 71-109.
- Kindopp, Jason, Carol Lee Hamrin, eds., 2004, *God and Caesar in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urch-State Tension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Kipnis, Andrew B., 2001, "The Flourishing of Religion in Post Mao China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Category of Relig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2(1): 32-46.
- Ley, David, 2008, "The immigrant church as an urban service hub." *Urban Studies* 45(10): 2057-2074.
- Nang, Leung Pak and Pun Ngai, 2009, "The radicalisation of the new Chinese working class: A cas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gemstone indust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30(3): 551-565.
- Potter, Pitman B., 2003, "Belief in control: Regulation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74: 317-337.
- Pun, Ngai,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olinger, Dorothy J.,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ompson, Edward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 Thompson, Edward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56-97.
- Lee, Joseph Tse-Hei, 2007, "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update."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49(2): 277-304.
- Wu, Fulong, 2010, "How neoliberal is China's reform? The origins of change during transitio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1(5): 619-631.
- Wu, Jiao, 2007, "Religious believers thrice the estimate." *China Daily* 7: 2007-02.
- Yang, Fenggang, Helen, Ebaugh, 2001, "Transformations in New Immigrant Religions and Their Global Implic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2): 269-288.
- Yang, Fenggang, 2005, "Lost in the Market, Saved at McDonald'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in Urban China."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4): 423-441.
- Yang, Fenggang, 2006, "The Red, Black, 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7(1): 93-122.
- Yang, Fenggang, 2011,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Fenggang, 2014, "What about China? Religious Vitality in the Most Secular and Rapidly Modernizing Society." *Sociology of Religion* 75(4): 564-578.

Yang, Mayfair Mei-hui, 2008, *Chinese Religiosities: Afflictions of Modernity and State Formation*.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